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女性移民的社會參與：台北市國小多元文化週外籍母親的文化展演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7-2410-H-343-026-
執行期間：97年08月01日至98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研究所碩士班

計畫主持人：邱琬雯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劉婉琪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8年10月05日

從展演經驗看女性移民的主體性重構：

台北縣市國小多元文化週的外籍母親

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探討「女性移民、文化展演與認同」三者之間的關連，並以台北縣市國小多元文化週的外籍母親為研究對象，由她們自身對展演經驗的詮釋，去分析女性移民主體性重構的過程。研究發現如下：(1) 這些可以現身、願意現身、並出來展演文化的外籍母親，確實具備了許多積極參與的正向特質，但展演動機的背後，卻隱藏了她們與自我、與夫家、與台灣大社會衝突，並試圖超越這些衝突所做的努力。(2) 她們的展演經驗主要是找回熟悉的今昔以及扭轉台灣人對其母文化的誤解，也就是返回原生文化或傳統文化去找尋慰藉。其內容通常是沒有太大爭議、早已定著的，談不上將傳統重新詮釋加以創新，也沒有和台灣文化做積極的對照對比，更不會觸及她們在台灣真實生活，特別是飽受夫家壓迫和大社會歧視那個層面的經驗。(3) 展演過後，她們自身的潛能開發與自信的增長確實存在，也從子女的肯認與學校中台灣人的接納，來省視自/他關係的良性變化。

關鍵字：展演經驗、新移民女性、主體性、現身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7-2410-H-343-026）之成果

目次

- 一、問題意識：隱形 vs. 現身
- 二、移民、文化展演與認同
- 三、外籍母親現身的困境
- 四、從現身到展演：尋找宣洩的出口
- 五、我演故我在
- 六、展演過後：自/他關係的變化
- 七、結論與後續

本文旨在從展演經驗看女性移民的主體性重構，並以台北縣市國小多元文化週的外籍母親為研究對象，先從隱形 vs. 現身來點出問題意識，再闡述移民、文化展演與認同三者之間的關連，接著說明外籍母親現身的困境，然後，以主體性的重構此一角度切入，分析她們為了尋找宣洩的出口如何選擇從現身到展演，我演故我在的真實展演經驗，以及展演過後如何感受自/他關係的具體變化。

一、問題意識：隱形 vs. 現身

近幾年來，由東南亞籍或大陸籍新移民女性¹自我訴求或是以她們為訴求的各種文化展演，在台灣社會的能見度逐漸提升，無論是美食、舞蹈，還是踩街、走秀、歌唱、藝能。從各地名為「異國心·台灣情外籍配偶生活適應活動聯誼會」、「多元文化服裝走秀競賽展示會」、「外籍配偶家庭終身學習成果博覽會」、「新住民嘉年華會」等活動中的展演，到校園多元文化週的現身介紹，一般台灣人越來越容易在公共空間看到新移民女性的身影，感受到和她們有關的異文化氣息（邱淑雯編2007、邱淑雯編2009）。本文主要鎖定校園的多元文化週為研究場域，並以願意到校現身、展演的外籍母親為研究對象，在此先來看的是，新移民女性人數及其子女人數高居全國第二多的台北市推動校園多元文化週的業務概況。²

以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教科編纂94~96學年度《台北市國民小學多元文化週成果匯編》的資料來看，多元文化週是依照《台北市政府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工作小組94年度第4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教育部推動新移民子女教育輔導計劃》兩項法源舉辦，實施時間在三月中旬，只有短短的一星期，教育局指定了幾個類項的實施方式及內容，包括：除了要求學生蒐集資料製作海報、辦理全校性展覽、多元文化學藝競賽或作品甄選外，還會邀請新移民父母到校向師生介紹母國生活

¹ 本文中的「新移民女性」是指2003年3月婦女新知基金會舉辦正名活動將外籍新娘改名之後的稱謂，「外籍母親」是指具母職經驗的這些新移民女性，「女性移民」則泛指有移動（migration）經驗的女性，三個用語將依內文脈絡交替使用。

² 依內政部戶政司2008年9月底的統計數字，台北縣是新移民女性人數（73080人）及其子女數（21065人，97學年度上學期）最多的地區，次多的是台北市，新移民女性人數是43616人，子女數是11801人（96學年度），參考2008年11月台北縣政府教育局新住民文教輔導科編纂的《台北縣新住民教育白皮書》23-24頁。

及文化特色，提供欣賞學習，結合節慶活動辦理多國文化風情展演等，主要展演內容是介紹各國（東南亞或大陸為主）的美食、歌謠、服飾、名勝、遊戲、特殊節慶以及簡單的打招呼用語。³

從94~96學年度《台北市國民小學多元文化週成果匯編》裡筆者發現，各校負責承辦的教師在呈給教育局的「回饋與建議」這欄當中，對於「邀請新移民父母到校展演文化」此一實施方式，出現了正/反兩種不同的意見：教師眼中看到了新移民女性及其子女對於現身（coming out, exposure）⁴以及對於來校展演的迎拒，還有教師對這項活動帶來的正負影響之看法。

首先，持比較否定論的教師發現，很多新移民家長不願曝光，參與也不踴躍，家長不願參與的理由主要是她們多有工作，很難在白天有空閒時間來校，此外，少數新移民家庭對活動抱持懷疑態度，或因夫家反對而無法參與。高年級的新移民子女比較不願暴露身分，不希望被標籤化，中低年級參與意願較高。至於可能的影響是，有教師指出校園中過度重視或突顯新移民文化，容易讓新移民子女因太過宣導被貼上標籤，不知不覺中，又再度複製社會對於他們的刻板印象。

其次，是持比較肯定論的教師認為，剛開始邀請新移民女性參與時，本人因自覺語言不佳或害怕無法勝任而退縮，經與之溝通後願意出面，其子女也滿意自己母親的表現。所以，鼓勵平素內向的家長上台介紹自己的母文化，可增強家長及其子女的榮譽感，藉由活動參與，外籍母親及其子女也普遍提升自信，對其身分較能悅納，將所知分享他人別具意義。就活動影響來看，外籍家長親自現身說法，介紹母文化效果特別好，學生對新移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不再有所偏見，並懂得關懷與尊重新移民及其子女，體諒他們遇到的困難，並思考協助的方式。

從上述各校教師所寫的「回饋與建議」中出現的這兩種意見，讓筆者進一步去思索：她們不願現身或願意現身的背後，是否還有更複雜的原因存在？到底是什麼樣的元素，影響那些身兼母職的新移民女性在接待社會願意現身、出來展演自己的母文化？出來現身及展演者的實際經驗是什麼？又，這些經驗與她們的主

³ 邀請移民到校介紹母文化的這類活動在日本和其他先進國家也有，參考邱淑雯（2008）。

⁴ 「現身」一詞原是同志研究極重要的概念，也是同性戀認同發展的主要面向，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新移民女性，她們多少也有現身的壓力，特別是在子女就學後現身於校園的這件事情上。

體性重構是否有所關連、如何關連？

二、移民、文化展演與認同

移民、文化展演與認同三者之間有著緊密的關連，簡言之，文化展演是移民在接待社會表達己身認同的重要方式。一般來說，移民在接待社會對於族群性（ethnicity）到底選擇要如何彰顯、如何隱藏，自有其特定的策略，族群性可能是移民在接待社會的生存資本、謀生工具乃至於認同依據，藉由與該族群或族群性相關的企業、食物、音樂、宗教、節慶等媒介，去表達對原生社會與接待社會親疏遠近之不等距離，以達到移民所追求的族群認同、國族認同、性別認同、階級認同或宗教認同，文化展演即是其中的一項重要管道。那麼，此處的展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或是展演行為到底所指為何？

高橋雄一郎（2005）將展演研究的對象分成三類：（1）舞台上的表演藝術活動、（2）日常生活中的展演、（3）文化上的展演，但展演研究通常被誤解為只局限在研究戲劇舞蹈等藝術活動，也就是分類中的第一項。⁵若所有事象都可視為是一種展演的話，展演研究顧名思義就是以「展演」做為關鍵概念，去理解、去記述、去批判展演這個現象的一門知識及研究方法。展演做為研究上的分析概念最早出現於 1950 年代，學術界逐漸普及要到 1960 年代的反動文化（counter culture）研究，特別是指相對於劇場中供人鑑賞、自詡上流的戲劇，那些在街頭或廢棄倉庫裡演出、直接要求觀眾參與的前衛戲劇，算是將既成文化解體或再構築的一個先例。1970 年代以後，展演研究加入後結構主義（post structuralism）等批判理論，研究對象從演劇、舞蹈等舞台藝術擴大到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和日常生活，文化人類學、精神分析理論、文化研究、同志研究、後殖民研究、口語表達及溝通理論等都與之有所連接。

高橋認為，「展演」行為其實至少有兩面意涵，簡言之：一是展演者去複製

⁵ 胡台麗（2003）《文化展演與台灣原住民》一書涵蓋三種文化展演的書寫：（1）對原住民部落實際祭儀樂舞的書寫、（2）這些祭儀樂舞舞台化之後的書寫、（3）民族誌紀錄片的書寫，該書主要處理文化真實、文化展演以及研究者社會實踐之間的關係。本文旨在說明「女性移民、文化展演與認同」的關連性，研究者的社會實踐不包括在內，但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是筆者的研究初衷、也是終極關懷。

社會上既有的規範，去維護一般人習以為常的價值觀，譬如男性必須是勇猛的，女性必然是纖弱的。二是展演者去推翻、去變更社會的既定規範，那些長久以來被所謂主流或正統價值觀排除、壓抑的人們，如何自我表達、自我再現，成了展演研究的重要課題。像是因種族、族群、宗教、言語、經濟、疾病、障礙、年齡以及性別等差異，而飽受歧視的人們或特定少數集團，為了確立自我的存在感，對於主流、當道、正統能夠提出什麼樣的質疑、抵抗、侵犯、逆轉和挑戰，受到展演研究者的矚目。

準此，本文使用的展演一詞，是用在長久以來被台灣主流社會邊緣化的新移民女性這群展演者身上，她們的展演行為比較偏重第三項也就是文化上的展演，但是，也很難說完全沒有舞台上的表演藝術活動之色彩，或是和日常生活中的展演全然無關。因為，新移民女性展演母文化這件事，雖稱不上專業的表演藝術活動，但她們仍是站在講堂、教室或舞台前方，必須有一定的登場準備，多少仍有表演的意味。同時，新移民女性展演母文化這個行為，也和她們的日常生活有關，是她們參與子女校園活動的延伸，也是她們找回熟悉的母文化、扭轉台灣人對她們母文化誤解之具體表達。因此，接下來探討「移民、文化展演與認同」之關係時，將同時涵蓋舞台上的表演藝術活動、日常生活中的展演、文化上的展演這三個脈絡下的展演行為。

許多文獻都在探討移民如何透過文化展演建構自我認同，May Joseph (1999) 在《浮游的認同》(Nomadic Identities: The Performance of Citizenship) 中將市民權、跨國主義或離散 (transnationalism or diaspora)、展演這三組目前極重要的知識概念相互結合，指出當代社會人口移動頻繁，透過功夫電影、心靈音樂、戲劇、演講等展演自己的母文化，成了移民表達自我、取得文化市民權的重要手段。該書連接了遷徙者在世界各地的移動軌跡，找出他們如何爭取浮游的市民權 (nomadic citizenship) 之過程，Joseph 關心的是所謂的市民權如何被呈現被表達，並強調文化是一種活生生的舞台裝置 (volatile mise-en-scene)，藉由展演，移民的市民權有可能在此出現。

浮游的認同之具體實例是，Lon Kurashige (2002) 研究第二代的日裔美國人不斷在「同化於美國」或「回歸到日本」兩者之間游走的過程，他以在洛杉磯舉

行的日裔第二代文化週 (Nisei Week) 也是美國年度規模盛大的日本文化節為對象，分析從 193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不同世代、階級、性別的日裔美國人文化認同的轉折。還有，翟振孝 (2005) 以祖輩從中國遷居到緬甸的華人，1960 年代前後遷移到台灣且聚集在中和地區的華人，以及 1970 年代由緬甸或經由港澳、台灣等地再遷徙至加拿大多倫多的緬華移民為對象，由文化經驗、環境調適與行為學習的展演取向 (performative approach) 出發，透過食物、潑水節、南傳佛教等不同展演方式，探討華人社群內部的主觀認同建構。

直接探討女性和展演關係的是 Laura B. Lengel and John T. Warren (2005) 合編《塑造性別：跨文化下的女性與展演》(Casting Gender: Women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s) 一書，從劇場、說故事、劇本書寫、迪士尼等不同型式或空間出發，有日常生活中 (mundane) 的展演，也有正式劇場中的展演，研究者透過和表演者及觀眾雙方的接觸，結合跨文化溝通理論、展演研究、女性研究、文化研究等取向，分析尼加拉瓜、北美、澳大利亞、德國、前南斯拉夫等地區被邊緣化的女性，包括貧困女性、原住民女性、女遊民、老年女性、黑人女性等，她們如何藉由展演去創造、去賦予社會意涵，以及建構自我認同。該書將文化、性別、認同等一般習以為常的概念，置於「展演」這個主軸之下，強調它們絕非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固定不變或單一價值的，而是透過展演者、觀眾、研究者多方互動激盪後，不斷被建構而流動的，會不停地演進且複雜多變。最重要的是，對女性的展演當事人而言，展演舞台可否成為她們賦權的舞台 (performative stage as empowering stage)，達到可能的自/他增能並強化其主體性？或者展演只是再製父系社會的霸權文化，還是兩者並存同時發生？都是值得深究的議題。也就是說，該書主張展演本身的意義與功能，可從個人、社會、政治等脈絡一一去加以剖析，展演行為是出於反抗社會抑是迎合社會的主流意識型態，這個判斷得透過展演者自身對於他和觀眾的真實互動，以及展演者自身接受來自大社會評價的感受而決定。

類似的觀點早先出現於 Laura B. Lengel (2004) 主編的《跨文化溝通與創意實踐：音樂、舞蹈以及女性的文化認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reative Practice: Music, Dance, and Women's Cultural Identity)，該書結集了夏威夷、印度、

羅馬尼亞、南非、巴貝多、越南、葉門、中國等各地女性展演的實例，包括：用喪歌歌曲保留傳統文化儀式的過程，以及在當代芭蕾舞、歌劇、舞蹈展演中，女性的身體如何成爲對抗權力壓迫（如父權制、階級制及國家機器）的一個可能戰場。該書強調文化與國族認同、族群性、性別、展演以及生活經驗彼此綿密的互動關係，重視音樂、歌曲、儀式及舞蹈對展演者和觀眾雙方所發揮的功能，將展演視爲跨文化溝通的重要手段，探討藉由展演活動這個實踐，女性如何去建構意義、傳遞社會價值、表達己身的政治立場及意識型態。

論述女性移民、展演與認同關係的是 Patricia Tamara Alleyne-Dettmers (2000)，她研究英國諾丁山 (Notting Hill) 地區的非洲裔加勒比海女性移民在嘉年華會中扮演的角色及自我認同，發現到嘉年華會連繫了在英加勒比海族人的情感，鞏固了文化種族的意識，譬如，以儀式舞蹈暗喻過去非洲歷史，重回非洲被奴隸制所摧殘的年代，撫慰那些曾被奴隸制殘害的心靈，女性移民也以嘉年華會服飾對抗西方的宗教迷思。除了文化種族上的特殊意義外，還有性別上的意義，女性移民藉由縫製衣物、記錄、管帳等活動參與，扭轉次於男性移民的地位，並透過服飾的誇張呈現，改變一般人傳統上對誘惑男人的女性 *Jamettes* 之刻板印象，使她變爲較有權力的文化創造者。在此可以看到，作者 Alleyne-Dettmers 強調女性移民在接待社會的文化展演具備了族群上與性別上的雙重意涵，換言之，透過這種參與，讓女性移民的族群認同與性別認同被凸顯出來。

和本文最直接相關的是前南洋台灣姊妹會秘書長吳紹文 (2005) 這篇，她提到因買賣婚姻延伸的社會歧視以及台灣人對東南亞歷史文化背景的無知這兩大因素的交乘下，使得新住民不願意凸顯母文化，亟欲將自己與子女快速鑄熔於台灣社會，然而，若新住民本身說不清楚母文化爲何，說服台灣人之可能性也會降低許。姊妹會的具體做法是，安排南洋婦女擔任多元文化教師，讓她們有機會向台灣人表達自己的能力，不論是透過語言教學、翻譯、廚藝展示、經驗分享或是社會貢獻。包括：演講分享如何調適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家庭關係；擔任「東南亞語課程」的授課老師，從授課資料的準備，強化母文化的認識和認同；國際會議席間讓東南亞婦女擔任翻譯，讓社區居民認知她們母語能力是值得重視的資源；邀約她們在「南洋飲食文化嘉年華」中擔任飲食文化講師，讓她們感受母文化被

人重視的一面，強化對母文化的認同；邀請她們擔任「東南亞多元文化種子教師研習營及教材發展工作坊」之講師，編寫東南亞文化教材，國小老師再將之轉化為教學內容，或者邀請新移民女性直接去上課；「南洋文化表演」不拘泥在傳統歌舞的展演，而是著重婦女自行創作之話劇，向地方居民表達自己心聲，譬如呼籲台下觀眾讓媳婦出來學中文。由此看來，新移民女性透過不同管道現身說法介紹、展演自己的母文化，確實讓她們本人也讓台灣人（社區居民、台下觀眾）更瞭解、認同東南亞的人文風土，新移民女性也由他人的肯認，而更加自我肯認。

透過上述的說明可以得知，「移民、文化展演與認同」三者間有著一定的關連，多數先行研究也都以積極正向的角度，肯定展演對（女性）移民在建構自我的認同與主體性上，確實發揮了一定的可能作用。準此，本文的定位是：不再把台灣的新移民女性當成等待救援、弱勢可憐、被邊緣化的外來者，而是去照亮她們的積極特質及行為，她們已經不再只是台灣政府單位或民間團體主導下的生活適應班、中文識字班、駕訓班、親職教室裡的聆聽者、學習者或被輔導者，更轉為一名站在台前侃侃訴說、展演自己母文化的外籍講師。所以，正視女性移民在展演中的自我意識與自我表達，展演過程中女性移民與自/他權力結構的抗爭過程，透過展演，女性移民的認同或主體性能否開展、如何開展，這些課題都成了本文的關心所在。

三、外籍母親現身的困境

為了捕捉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社會真實的展演經驗與歷程，本研究訪談了新移民女性十位（其中九位是外籍母親）以及各校承辦多元文化週的教師七位，試圖做更深入的掌握。訪談期間是 2009 年 3 月中至 5 月初，訪談對象包括曾經到台北市的大理國小、古亭國小、延平國小、志清國小、民生國小、華江國小和台北縣安和國小、秀山國小展演母文化的十位新移民女性（表 1），她們有的是子女在該國小就讀，有的是本人在該國小讀過補校或成人識字班；此外，也訪談台北市東門國小、古亭國小、懷生國小、延平國小、民生國小、華江國小以及台北縣的安和國小等各校輔導室承辦多元文化週的教師共七位。選擇這七所國小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各校曾於 94~97 年度辦理多元文化週期間，邀請外籍母親到校展演文

化；二是這七所國小分別位於優/弱勢學區，所謂優/弱勢學區是指家長社經地位之高低以及學童學習表現之強弱，優/弱勢學區新移民子女就學人數大不相同，重要的是，優/弱勢學區會是影響外籍母親及其子女現身校園的因素之一，故分別選取代表優/弱勢學區之學校，以期看到個中的差異所在。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化名	國籍	族群	學歷	年齡	來台年數
小暉	中國	漢人	大學畢	40~	2年多
阿紅	中國	漢人	高中畢	40~	11年
翠翠	緬甸	華人	高中畢	40~	10多年
月音	馬來西亞	華人	二專畢	36	5年
珍珍	新加坡	華人	專科畢	43	18年
阿香	越南	京族	大學肄，國中補校畢。	40~	9年
小沛	越南	華人	高中畢，空大	34	14年
長玲	越南	華人 + 京族	高中畢，國小成教班肄。	29	7年
榮兒	印尼	華人	大學畢，國中補校畢。	40	10年
安安	印尼	爪哇人	高中畢，國小成教班肄。	32	9年

(注)：除安安已婚沒有小孩外，其餘受訪者都有母職在身。

筆者已在「問題意識：隱形 vs. 現身」中整理出各校教師對於「邀請新移民父母到校展演文化」此一實施方式正/反不同的看法，接下來透過訪談，將繼續深化這些教師所寫的書面內容，焦點鎖定於：教師認為外籍母親不願以及願意現校園的理由到底為何？探討本文中願意現身校園、展演文化的外籍母親她們的經歷之前，在此，先來做對照式的思考，也就是說，先來看看到底有哪些因素造成絕大多數的外籍母親不願、不能現身校園。

陳雯鈴（2008）整理國內有關家長參與（parental involvement）子女校園生活的文獻時發現，台灣社會「以女性為主的中產階級家長參與模式」被視為常態，家長需具備一定的語言和識字能力、了解學校的慣用語言與學校文化、有空閒的時間、具某種經濟能力等，這些是家長參與子女學校教育的基礎，換言之，不具這些條件資質者，難以參與子女的校園生活。目前為止，國內許多先行研究從母職（motherhood or maternity）實踐的困境與克服此一角度，探討新移民女性在台的

種種生活適應，譬如，關於新移民女性在子女入學後的母職經驗之研究，常強調母職功能的不彰，並凸顯阻礙母職實踐的因素，包括教養援助少、經濟壓力大、有心無力、受限的語文能力、缺乏母國支持網絡、居間系統（mezzo system）的封閉性等，但這些外籍母親會透過參與親職教育工作坊、寄託於安親班、以子職反饋（children undertaking motherhood's duties）、姐代母職等方式去克服或彌補。（陳雯鈴 2008、王光宗 2007、黃淑玲 2007、韓建忠 2006、林慧卿 2006、張明慧 2004）上述提到的諸多阻礙因素，也發生在影響外籍母親現身子女校園、參與校園事務上，那麼，從各校輔導室承辦多元文化週的七位教師眼中觀察到外籍母親不願、不能現身校園的理由可能有哪些？分別從外籍母親本人、子女、學區三方面去分析。

（一）問題若是出在外籍母親本人的話，大多是她們「爲了生計打拼、工作忙、沒時間」，這些確實是影響外籍母親不來學校的最主要因素，但這也發生在社經地位頗高的駐台辦事處官員德國爸爸身上，他也是以工作太忙爲由，婉拒校方的邀請。可是，身處弱勢的外籍母親會又馬上推說「我不能、不行、不敢、不太會講、不知講什麼！」要不就是給個模擬兩可的拒絕。受訪的教師普遍認爲，這是因爲她們自信不夠、能力不足、對親職教育力不從心、原本就不太重視子女教育、單親或離婚者不想曝光等因素使然，這些都造成她們怯於現身子女的校園。譬如，有的外籍母親只能躲在家裡照顧老小或是幫傭帶孩子、被吃喝嫖賭的先生虐待家暴，這是老師和社區志工共同家訪時親眼看到的，這類母親根本不可能現身校園。

還有，所謂的「自信不夠、能力不足、對親職教育力不從心」等因素，普遍出現在外籍母親中文能力的弱勢這點上，中文表達能力不好、口音太重，會是她們退縮的原因，害怕被其他家長或學童歧視，甚至被自己的子女瞧不起。同樣地，這也並非只發生在東南亞及大陸籍的母親身上，位於優勢學區的民生國小之日本媽媽自覺中文能力太弱，即便老師再三邀請，她也不願出席學校多元文化週及其它相關活動。除了中文「說不好」這層困境外，若是「聽不懂」自然也不想現身校園，學校舉辦親職講座廣發邀請函給所有外籍母親，但她們幾乎都不來，理由是「我去了，也聽不懂！」有人確實出席了，但老師發現她們呆座兩小時後，仍

然說聽不很懂。因此，有老師認為校方要去思量的是，學校是否有適合外籍母親參與的活動，譬如，不太需要使用中文表達的導護媽媽志工，她們或許可以勝任；但如果是晨光媽媽要在教室幫忙學童進行補救教學的話，這位母親必須有一定的知識及中文能力，擔任學校的圖書館志工也要會中文電腦輸入，瞭解中文書籍的編排方式，無庸置疑地，這類活動都在考驗著外籍母親的語文能力。

（二）若從子女的方面來思考，有的老師認為，外籍母親不來學校的原因不是出在自己，而是出在子女身上，可能是子女在校造成老師同學的「困擾」，如果這個學童在班上人際關係好就沒問題，他的母親出席也不會遭到排斥。其次，子女對母親的看待和反應也影響母親現身校園，有的孩童會以母親的「口音、長相」為恥，因為一聽、一看就知道是東南亞或大陸的，對母親沒有信心，想隱藏自己母親的身份，這也可能造成母親不願現身校園；或是母子雙方平常溝通就不太好，孩子根本不希望母親現身，母親自然也就不會出現了。

再則，比起低年級的孩童，對於高年級的新移民子女不願暴露身分、不希望被標籤化、也不希望母親曝光一事，不少老師表示，這並不全然因為他是新移民子女之故，而是孩子越到高年級其主體性或自我意識就越強，本國學童也好外籍學童也好，都比較不喜歡父母常到校園來。同樣地，有些外籍母親在小孩還在讀幼稚園時會熱心參與校園事務，那是基於子女安全的顧慮，已經參與過的母親後來就不想再來學校，可能是小孩大了，認為有老師照顧就夠了，覺得不需要經常出面。因此，受訪的老師認為，此一現象普遍存在，家長的校園參與通常會隨子女的年級、年齡而遞減，無論是本國籍母親或外籍母親。

（三）值得一提的是，優/劣勢學區（school district）也是影響外籍母親現身子女校園的重要因素，民生國小地處台北市的優勢學區，家長社經地位普遍都高，無形中對所謂新移民母親及其子女現身校園造成一種壓力，該校承辦多元文化週的老師認為，這種現象可說是「優越的欺壓」，此區有錢家長太多，疼小孩、奉獻學校的家長也多，譬如，參與晨光活動的父母會買糖果、餅乾、禮物請全班小朋友吃，這種慷慨舉動可能讓經濟弱勢的外籍母親更不敢現身，因為會相形見绌、完全被比了下去，也怕自己孩子被同儕貼上標籤。因此，會現身校園的外籍母親通常是申請低收入戶或補貼方案時匆匆來去，放了申請表格就走人的，至

今，該校沒有東南亞籍父母願意出來現身展演，除了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自新加坡的珍珍。

但相反地，土城的安和國小屬於台北縣的弱勢學區，95 學年度時該校新住民學童人數就已超過 100 人以上，被縣政府教育局列為重點學校。此外，該校已經有太多弱勢標籤，除新住民外，還包括單親、隔代教養、低收入戶等，相關的福利補助如早晚餐券、春節慰問、獎助學金等也很完善，換句話說，弱勢已經是一種常態，家長學生對弱勢都不陌生，新住民並非唯一的弱勢標籤，所以也就不這麼醒目了。該校的多元文化週活動結合了親子教育及家庭教育，從低年級開辦，教師發現，外籍家長的參與度很高，可能是許多外籍母親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殊，學區內太多弱勢標籤就變成沒有標籤、或彼此都忘了標籤。

從以上七所承辦多元文化週的國小教師之訪談中得知，外籍母親不願、不能現身校園的原因有很多。相較於各校負責承辦的教師呈給教育局的「回饋與建議」欄中，對於「邀請新移民父母到校展演文化」此一實施方式，只出現正/反兩種不同的書面意見，筆者透過訪談所得到的答案裡，讓我們更清楚知道：無法現身的原因可能出在外籍母親本人身上、子女身上或是優/弱勢學區等三個方面，而且，外籍母親及其子女也因諸種狀況無法現身校園，所謂的諸種狀況當中，有些似乎與外籍（父）母親的國籍無關，也與子女是否為本國籍或外國籍無關，因此，完全歸咎於外籍母親本人能力資質不足而無法現身的這種說法，並不確實。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忽略那些可以現身、願意現身、並出來展演文化的外籍母親的確已經存在，她們之所以可以現身、願意展演的理由，和上述這些無法現身的外籍母親成了強烈的對照，接下來，將透過「從現身到展演」的歷程說明，窺看這些新移民女性如何跨出主體性重構的一步。

四、從現身到展演：尋找宣洩的出口

主體性（subjectivity）是社會學、哲學、心理學等人文社會學科長久以來探討的核心概念，古今中外眾多學者對其提出不同的定義與闡釋，本文將援引吉田民人（1991）、小林久高（1997）、田辺明生（1999）三位日本學者的說法，並緊扣各段脈絡來做具體的鋪陳。首先，吉田民人（1991）定義的主體性是：面對統御

自/他的各種資訊資源，可以由個人自我創發、自我選擇的一種存在樣式。換言之，主體性的論述勢必牽涉到資源掌握與處理的問題，忽視資源這個層面的主體性論述只流於空洞的觀念論，因此，爲了明確主體性到底爲何，必須充分說明「主體性、資源、所有」的狀況及其條件。依照他的說法，「所有」是指在社會上的統御能力，各種主體擁有不同的財貨資源，特別是生產手段和生產物，關於特定資源之處理，特定主體會依尋自律的有效的意志決定加以行動。那麼，從學校教師的立場來看，這些能夠出來展演文化的新移民女性，到底具備了什麼樣的資源與所有，而得以讓其主體性有所發揮呢？和上述那些不願、不能現身校園的外籍母親相較，這些女性是否有著非常大的不同特質呢？

接受本研究訪談的十位新移民女性（九位是外籍母親）當中，除了阿香、小沛、榮兒三位，是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第四科負責新移民會館業務的承辦人員所引介外，其餘受訪者是透過上述某四所國小老師的安排而取得連絡。從學校教師的角度出發，之所以能找到這些願意現身並出來展演的外籍母親，是因爲她們平日熱心擔任志工媽媽，參與學校事務，努力學習或適應台灣文化，願意接觸子女的學習環境，換言之，她們出來展演文化是親師彼此熟識瞭解、且有信任基礎所延伸出來的。重要的是，教師眼中的她們，大多具備了積極參與的特質或條件，許多教師異口同聲地說，這些願意現身、願意展演的外籍母親之特質至少包括以下兩點：（1）夫家經濟狀況還算穩定或至少不是很差，她們本身不用工作或是沒在工作，要不就是做有彈性、可自行調配時間的工作，因此，白天才有空閒到校來參與。（2）這些外籍母親普遍具有開朗、積極、不太會害羞、勇於嘗試、敢秀又有自信、喜歡學習、中文表達能力好等諸多正向特質，當教師邀請她們參與多元文化週的活動時，只要預期場面是可控制的，本人都樂意現身幫忙。

譬如，延平國小教師指出，該校兩位出來展演的外籍母親，校方平常就與之互動，她們也經常在學校現身，其中一位是該校戲劇志工團團員，另一位長期擔任志工媽媽及現任家長會副會長，都屬主動參與而非被迫或應付了事。她們夫家的經濟狀況還可以，至少沒有窘困的壓力。多元文化週的課約四十分鐘左右，兩位的表達能力及流暢度也夠支撐、台風穩健，教材教具都是自行準備，大綱也能自行擬定。同樣地，華江國小教師高度肯定該校出來展演的越南母親，她是一位

學習心非常旺盛的人，和婆婆原本一同在成人識字班上課，學歷也不差、學習態度佳、上課認真，不像有些新移民女性只爲了累積時數換身分證才出席，學習興趣缺缺。承辦老師和婆媳平常就有互動，先尋問婆婆可否讓她出來展演，答應後爽快借出只在喜宴上穿過一次的越南長衫，並在多元文化週的晨光時間出來介紹越南語的打招呼。土城安和國小的主任也說道，該校出來展演的越南母親本身條件很優又很積極，教育和經濟水平都不低，加上夫家的支持，她也認同自己目前的生活模式、認同學校教育、認同教師，願意透過展演自我肯定，還拉自己女兒同台表演、相當出色。

從教師的敘述中清楚知道，這些可以現身、願意現身、並出來展演文化的外籍母親，確實具備了許多積極參與的特質。除了阿香、小沛、榮兒三位和新移民會館有較多接觸得以擴大校園以外的展演機會，或是像珍珍本身因參與慈濟大愛媽媽的志工活動而常到各校園展演《靜思語》的故事外，本研究的受訪者大多只有一兩次於校園多元文化週的展演經驗，所以，當筆者訪談這些外籍母親如何從現身到展演時，她們其實是把展演與「走出家庭、向外發展、當志工、學習」劃上等號或當成一種延伸活動。值得注意的是，和教師眼中看到的光景有所不同，在進一步詢問這些新移民女性時發現，所謂積極參與的特質背後，似乎隱藏了她們與自我、與夫家、與台灣大社會衝突，並試圖超越這些衝突所做的努力，這個部份的經驗詮釋，是身爲學校的教師比較不易觀察到的，卻是她們願意現身、願意展演的另一動力來源，不容小覷，也成爲研究者觀察她們主體性重構的重要切入點。

小林久高(1998)探討社會學與主體性的關係時曾說，對現代社會的人而言，必須面對的是主體性「如何被剝奪」以及「如何被找回」的基本問題。從社會學角度來思考主體性時，先得定義何謂主體性，並說明透過社會學的什麼研究方法或理論可以掌握人的主體性。他以行爲理論(action theory)中的行爲、價值觀、行爲者、狀況等基本用語爲參考，找出社會問題和社會關係中主體性的可能定義。依照他的說法，所謂主體性有四項特質：積極達成目標、依據自我價值觀採取行動、對自我價值觀加以反省、以社會改革爲目標等四種行爲者之特質。前三項「積極性、價值一貫性、反省性」強調的是行爲者做爲自我主人的層面，第四

項以「社會改革」為目標則著重行為者做為社會主人的面向。他進一步提出思考主體性問題的三個基本方向：(1) 分析具主體性的行為及行為者採取行動時的個人內在機制；(2) 解構行為者與他所身處狀況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具主體性的行為以及個人之所以成立的狀況條件；(3) 找出影響個人狀況條件之所以成立的那個更龐大的社會結構，特別是該結構對於主體性重構所產生的制約，換言之，就是找出影響具主體性的行為及其個人的社會結構。

藉由上述小林對主體性定義的說明，特別是他指出思考主體性的三個基本方向：內在機制、關係、結構，接下來，分別從「相對剝奪感的彌補、從夫家的壓迫中逃逸、從大社會的歧視中遁走」三點，來捕捉新移民女性為何會想要現身校園、為何會想要出來展演的個人內在機制，這個內在機制的產生，又和她們身處的狀況關係以及影響她們行為的那個大社會結構息息相關。也可以說，分析她們為什麼想透過展演重構主體性時，必須找出她們的主體性「如何被剝奪」以及透過展演「如何被找回」的過程，本節先討論前者，這些主體性被剝奪的真實經驗，也是把她們從現身推向展演、進而尋找宣洩出口的重要原因。

在此，為了凸顯新移民女性的展演經驗與主體性重構之間的關係，本文借取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對位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這個概念來做鋪陳。Kennedy, V. (2000) 在論述薩依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時說到，該書是《東方主義》（1978）的延伸之作，但不只偏重解構西方對於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以及其他形式的宰制，並且，將抵抗與反對此種宰制（帝國主義以及新殖民主義）的議題也涵蓋其中，雜匯與對位閱讀正是薩依德提出的主要抵抗方法。（邱彥彬 2003：164-165）「對位」一詞取自西方古典音樂的對位（counterpoint）概念，藉此，他以音樂結構來釐清敘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抵抗之間的關係。「宗主國的歷史」以及「遭到宰制論述壓制（以及與宰制論述合作）的其他各種歷史」兩者，構成了對位閱讀的主軸，簡言之，來自宗主國的文本必然要與來自邊陲國家的文本合併閱讀，對位閱讀必得同時涵蓋帝國主義與抵抗這兩面，採取的是一種更為廣闊的觀看角度。（邱彥彬 2003：211-212）

依尋這個脈絡，在論述新移民女性的展演經驗與她們的主體性重構之關係時，筆者想強調的是，教師與新移民女性兩者不同的發言位置，特別是強調來自

新移民女性本人對於宰制的認知以及她們對於宰制所採取的抵抗策略，具體順序是：除了從教師口中得知那些可以現身、願意現身、並出來展演的外籍母親積極參與的特質外，進一步要去對照的是，她們如何詮釋與自我、與夫家、與台灣大社會衝突，以及透過展演，她們試圖超越這些衝突所做的努力。

（一）相對剝奪感的彌補

小暉、月音、阿紅、珍珍都是長期在學校當志工媽媽，除了月音最近開始在素食餐廳打工外，小暉、阿紅、珍珍算是純家庭主婦的非受薪階級，她們現身校園的共通理由之一是爲了轉換負面情緒，無論這個負面情緒是來自個人、來自夫家還是來自台灣大社會。小暉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來台前做過記者、主編以及法律事務相關工作，目前是自創的兩岸文化交流協會的負責人。她之所以在多元文化週時出來展演，是因爲參與學校的志工媽媽而和該校老師熟稔，重要的是，她在台灣沒有身份證根本無法工作，曾經去上移民署爲大陸配偶開的就業輔導班課程，那些基礎內容如中醫、電腦等她都早已學會，自認爲比授課教師還要專業，但她仍想回饋社會、想出來發揮所長，女兒就讀的國小就是她找到的一個重要平台。出身馬來西亞曾當過平面模特兒、舞蹈員、且拍過洗髮精、磁磚、房屋等廣告的月音，剛來台灣時非常適應不良，她說自己確實有點小偏差，每天在家很悶不是辦法，想走出來透透氣，所以就到女兒的學校當志工，而且她很黏小孩，來學校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也比較安心。

相對剝奪感（feeling of relative deprivation）原是用來解釋人之所以「不滿」的理論，其定義是：個人不滿的情緒，並非源於他所處的客觀環境之惡劣，而是起因於他所期待的水準與到達的水準之間的落差。相對剝奪可分成三類，（1）個人型（individualistic）的剝奪：個人或集團抱持的期待水準，並非來自於參照群體（reference group），而是依個人過去的生活經驗去判斷。（2）自我本位型（egoistic）的剝奪：個人抱持的期待水準，受到參照群體的制約，並和個人的遭遇相對比。（3）友愛型（fraternal）的剝奪：參照群體的期待水準和個人所屬的參照群體相較後，產生的落差及不滿（Runciman 1966）。由此看來，「自/他的參照群體」以及「個人過去/現在的經驗」這兩點，成了當事人判斷是否感覺相對剝奪的重要依據。要問的是：小暉、月音她們到底覺得自己被剝奪了什麼？從訪談中無法得知

兩位參照群體到底為何，但可以明顯地發現，她們的相對剝奪感主要是個人型的，也就是依她們個人過去的生活經驗，去判斷相對剝奪感的與否及輕重。來台灣之前，兩位都具有不錯的學歷、條件、能力以及工作經驗，但來台灣之後，無論是主動或被迫，卻只能圈限於家中有志難伸，此時，學校的志工媽媽活動，成了彌補她們相對剝奪感的重要出口。

（二）從夫家的壓迫中逃逸

夫家，是深刻體驗父權的極重要場所，女性從步入父系婚姻的那一刻起，夫家的人們會以各種型態方式告知身為媳婦的次等位置，寄人籬下的被控身份。（黃怡瑾 2001）台灣的家庭形態主要是傳統儒家的父系家庭（patrilineal family），自古以來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禮教，以及由此為軸心所延伸出去的社會關係、人際關係之衝突，一直不斷箝制著婚姻中絕大多數的女性。新移民女性自然也難逃這樣的命運，再加上台灣人對東南亞邊陲、落後的認知以及對中國特殊敵對國的想像，使得她們被迫身處多層板塊的壓擠當中，在不平等的家庭權力關係裡殘喘。

本研究所謂新移民女性的夫家成員，除了婚姻關係中做為配偶的丈夫這個人之外，還包括夫家其他同居親屬：代間關係（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中的公婆乃至上一代的祖父，以及夫家平輩女男姻親（sister or brother by marriage）裡的小姑或小叔，其中，特別是以婆婆為首的夫家同居親屬，常常成為壓迫她們身心的最主要來源。（王珮瑾 2007、蘇芳儀 2006）阿紅和珍珍選擇現身、展演的理由之一，都是為了躲避夫家的沉重氣氛或有形無形的精神壓迫，子女就讀的校園，成了她們逃逸之後寄託的空間，也是她們轉換心情、進而自我增能的重要場域。阿紅在原生家庭是老么，深受父母寵愛，自認為容易胡思亂想心胸狹隘，來台後又一直和公婆、小叔、小姑等十口同住，非常痛苦抱怨也多。她嘗試先到學校做志工，目前是週一週四當導護，週三是大手牽小手帶小朋友到圖書館看書，週五是圖書志工，又常參加學校舉辦的讀書會、親職教育和自我成長的課程演講，現在日子過得非常充實。

面容清秀卻略顯疲憊的珍珍，說起話來溫柔婉約，卻承受來自婆婆很大的壓力，她說婆婆極端重男輕女，且對新加坡有很深的歧見，認為和其他東南亞國家

一樣落後，雖然跟她回過新加坡做月子，雙方仍不時吵架對罵，加上先生是獨子，但工作關係經常奔波海外，讓她必須獨自面對嚴峻的婆婆，經年累月飽受精神虐待和折磨。珍珍努力找尋解決途徑，在子女上小學後，校園成了她負面情緒的宣洩出口，她開始擔任放學後的導護、在晨光時間講故事、運動會和校慶也都出席參加，甚至加入慈濟大愛媽媽志工。

阿紅、珍珍或許還算是「幸運」的，因為，至少丈夫本人支持體諒她們的處境，雖然夫家的家庭氣氛令人沉悶難過，但經濟狀況也還可以，讓她們免於在外工作養家的奔波辛勞。比較嚴重的是，受訪者中有人得不太到丈夫的直接援助，還得面對同居者的公婆、小姑等人不平等之對待，被迫操持洗衣、煮飯、打掃、照料等絕大多數的家務勞動，卻不被諒解、不被尊重，同時，必須出外從事薪資工作賺取家用錢。台灣新移民女性在夫家的這種境遇，和近年來與韓國男性通婚的中國或東南亞女性頗為類似，因為，台灣與韓國普遍存在著壓迫女性移民雷同的社會結構，簡言之，這裡的壓迫除了源自西方世界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的思維，也就是源自種族主義（racism）以及將女性身體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思維外，還包括了東方社會「傳統父權制下兩性不平等角色分工」這套意識型態的作祟。當跨國婚姻遇上父權制下兩性不平等角色分工之意識型態時，男性雖然仍是家庭生計的主要提供者，但女性則被期待成行使家務勞動的主婦、一家老小的照料者以及勞動力的生產者，這種意識型態結合了種族、性別、階級等多重不平等的結構，彼此纏繞地箝制這些漂洋過海尋求新生的女性。（安貞美 2008）⁶

在這種家務、職務兩頭燒的雙重夾縫中，她們找到的可能出口就是學校或其他在外的空間，無論是為了展演、還是為了讀書。週一~週五在新移民會館、移民署、醫院、法庭等處做通譯，還得上很多通譯志工培訓課程的阿香，婚後一直以來都和公婆、小姑同住，六口之家每天都得由她煮好兩頓飯上桌，但家裡氣氛很沉悶，公婆小姑都不好溝通，她也不想打擾，以前請過越南女友來家中，家人

⁶ 這種跨國婚姻到底是「強化」還是「鬆動」了父權制，一直備受討論，主張後者的人觀察到，那些接受中國社會主義教育洗禮後才嫁來韓國的朝鮮族女性，多具有較高的主體意識，這也造成她們和韓國夫家家庭的衝突越顯激烈。（田淵知子 2008）另外，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的性別文化，很多是採取非單一父權制的雙系制（bilateral system），這也是鬆動韓國父權制的潛在因子。（安貞美 2009）

不太高興，後來就沒再邀了，而且婆婆不喜歡越南菜，她也不敢再煮了。阿香爲了轉移自己在夫家家庭中悶悶不樂的情緒以及不受重視的地位，選擇經常往外跑，工作之餘，不斷參加各種識字班、烹飪班、讀書會及展演活動，每天幾乎是行程滿檔，失業在家又生病的丈夫，個性安靜沒有反對也不過問，隨便她愛做什麼都可以，前提是一定要把家事先打點好。

同樣地，目前在寵物店幫動物洗澡剃毛還兼打掃的安安，是受訪者中唯一沒有母職的新移民女性，她先來台灣當三年外傭，後來才和本地人通婚，婚後和丈夫、阿公（丈夫的祖父）、公婆以及不打算結婚的小姑同住一個屋簷下。安安在婚後的前五~六年，不僅要照顧年邁體弱的阿公，還要負責家中的打掃煮飯洗衣，尤其甚者，愛打牌的先生和公婆都不喜歡小孩，也暫時不允許她有小孩，雖然她非常渴望。此外，婆婆不愛她帶印尼朋友回家，更不喜歡吃印尼菜，她是泗水的爪哇人回教徒，卻開始不得不吃豬肉。婆婆脾氣壞經常和她吵架，但又限制她出門接觸外在世界，怕她做歹事，除非是上中文課及貼補家用這種「正當」活動。直到去年，她才出來讀國小的成教班，是因爲公公先退休了可以幫忙，但家人都希望她出去賺錢，所以在寵物店找到了這份工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安安在夫家像是身兼外籍女傭（foreign maid）和外籍看護（foreign caregiver）的雙重家務勞動者，同時，還被迫外出扮演家計分擔者或養家者（breadwinner）的角色，但是，她渴望的母職卻被夫家完全剝奪、否定掉，能呼吸到外頭新鮮自由空氣的只有中文教室了，也就是在那裡，她有機會出來介紹展演印尼的飲食文化。

（三）從大社會的歧視中遁走

除了來自夫家家庭及其成員的壓迫外，來自台灣大社會的歧視或不太友善的對待也如影隨形，本研究的受訪者除了阿香（越南京族）和安安（印尼爪哇人）兩人外，其他都具有華人血統，中文表達流暢，算是「同種不同文」的跨國婚姻移民，這些人沒有因外在目視可見（visiual）的膚色或長相，而承受太多直接而露骨的異樣眼光。但即便如此，她們還是因爲口音（accent）及身份的特殊性，經常莫名其妙地被台灣人污名化，無論是來自大人或是來自小孩，也無論她們是出身亞洲的什麼國家。

這從嫁到韓國的中國朝鮮族女性身上也可清楚看到，韓國是標榜單一民族、

血統主義為尊的父權制社會，1990 年代初中韓建交後，中國出身的朝鮮族女性於「雖不同文、卻還同種」的條件下，比起其他東南亞地區出身的外籍女性，在韓國的跨國婚姻市場中佔有一定優勢，她們卻仍遭受來自「韓國同胞」歧視性的白眼。此類因「同種不同文」而衍生出對外來移民口音不純的嘲笑頗為普遍，玄武岩（2005）的研究指出，韓國國營電視台 KBS 節目裡，把中國東北朝鮮族特有的「延邊腔」當成揶揄的對象，雖然，朝鮮族透過各種民族教育努力學習正確的韓語發音，但韓國人對「同種不同文」的這些外來移民（跨國婚姻者、打工者、偷渡客）說出的腔調，視為「不純粹、雜燴的二流韓語」，不僅刺耳且嗤之以鼻。可以看到，接待社會對移民的歧視有很多種形態，對於口音的偏見，正是這種歧視結構下曝露出一種病態，它存在於日常生活裡俯拾皆是，有時是直接而露骨、有時則間接而隱約，但都讓當事者的移民尷尬不已、無所遁形。也因此，這種不愉快的歧視經驗長期積累下來，多少促使這些新移民女性想去追尋一個比較善意而寬廣的天空，以取得短暫的平衡及慰藉。

來自雲南的小暉在女兒剛轉到台灣的國小唸書時就出席學校日，知道家長會在招募志工也馬上報名，她說做志工是爲了自己也爲了女兒，小孩的適應和人際關係很重要。開學日時碰到其他大陸配偶，她們教小暉說自己是「外省第二代」不要說是大陸人，提醒她自己現身展演可以，但不要讓孩子也出來，因爲偏見或有色眼光是存在的。但是，她的女兒很有表現慾，她也有正面理念不想躲藏，接受自己也希望別人接受她，所以還是勇敢地現身了。

馬來西亞出身的月音曾好心提醒小朋友不要在馬路上亂跑亂撞很危險，卻被誤認是大陸人而噙說「妳是大陸人，你講什麼我聽不懂啦！」她很難過很生氣，雖然自己不是大陸人，但反問大陸人不是人嗎？她認爲台灣有很多種族歧視，去菜市場買菜時常和人聊天，但只要她一開口講「我們那邊是怎麼煮的……」，對方聽到就馬上不理人了。

越南華裔出身的小沛來台之前只會廣東話，根本不懂中文的聽說讀寫，嫁來台灣後到百貨公司買衣服，店員一聽到她說話的口音，好像當她沒有購買能力，就把衣服拿起來甩一甩、又順手疊了回去。還有，剛來台灣時她看起來很年輕口音又很重，去菜市場也常被人看輕地問道：「妳是被花多少錢買來的？」

已經來台十八年幾乎沒什麼口音的珍珍是新加坡華人，新加坡是台灣人眼中比較先進的東南亞國家，但她仍有些不甚愉快的小經驗。當初她的小孩都在新加坡出生，以英語為母語，對國語比較陌生反應不過來，有時會被台灣人誤認為「不同、怪怪地」，直到進入小學後才慢慢習慣中文。除了小孩之外，她本人也覺得和一群台灣媽媽在一起時，新加坡總被認為是「東南亞那一塊的」，她們對珍珍的態度就是沒有辦法和對台灣人一樣開放或是有說有笑，溝通似乎也不是那麼順暢。

當然，來自大社會的歧視也發生在「既不同文、又不同種」的女性移民身上，水越紀子(2003)研究在日本的菲律賓女性如何詮釋飽受接待社會邊緣化的歷程，從她們與左鄰右舍、自己的家人親族、澡堂的日本人之真實接觸所感受到的孤立與無助，去解析日本人面對非我族類時歧視性的文化結構。同樣地，在台灣沒有華人血統的阿香非常明白，台灣人根本看不起她們這些嫁過來的越南人，有時候連自己的小孩也是如此。有個越南小孩曾對她母親說：「拜託喔，妳不要在校門口講越南話好不好！同學都笑我啦，台灣人都不要和我玩了！」她聽到這種話非常害怕，所以努力學中文和孩子一起共學，積極到補校讀書參加檢定考。阿香講話的口音比較重，她碰過壞壞的台灣人欺侮外籍配偶「不懂」，問路時故意講錯方向，那次她還是問計程車司機，本來要去仁愛醫院，卻指她去國泰醫院，後來她學乖了都直接問警察或開店的老闆。

綜觀上述「從現身到展演：尋找宣洩的出口」之說明可以得知，透過承辦多元文化週的教師眼中看到的是，這些可以現身、願意現身、並出來展演文化的外籍母親確實具備了許多積極參與的特質，不容否認；然而，所謂積極參與特質的背後，卻隱藏了她們與自我、與夫家、與台灣大社會的衝突，這也成為她們願意現身、願意展演的另一動機來源。換言之，從「相對剝奪感的彌補、從夫家的壓迫中逃逸、從大社會的歧視中遁走」這三點，我們窺見到新移民女性她們主體性「如何被剝奪」的真實過程，接下來要追問的是，透過展演，她們的主體性又是「如何被找回」了呢？

五、我演故我在

本文所指的展演經驗 (performance experience) 是指：新移民女性在公開場合介紹、表演自己的母文化或相關才藝的實際體驗，公開場合包括舉辦多元文化週的校園以及其他節慶活動、異文化交流的室內外公共空間。多元文化週的展演場地有大有小，有的是外籍母親入班，有的是在全校朝會或容納多人的大禮堂內進行，展演方式除了靜態的講述說明外，也都會當場動態示範，像是代表性的料理或是特殊服飾的穿法。筆者認為，她們把展演當成試圖「找回被剝奪的主體性」之手段，分別從找回熟悉的今昔、扭轉對母文化的誤解這兩點來做陳述。

(一) 找回熟悉的今昔

新移民女性實際展演的母文化包括了她們所熟悉的過去以及熟悉的現在，這些都是她們生命經驗的重要部份無法割捨，「熟悉的過去」是指存在於母國社會情境中特殊的人事物，譬如古蹟、制度、節慶，「熟悉的現在」則是她們到台灣後繼續在日常生活中展演的飲食、舞蹈、語文等。

阿紅說「地上看北京，地下看陝西」，她講陝西講最多的還是自己的故鄉西安，像西遊記中的大小雁塔、華山、華清池、楊貴妃、秦始皇、兵馬俑，圖片說明外，還秀出兵馬俑模型戰車、錢幣等實物介紹，播放陝北《黃土高坡》的歌曲帶動氣氛，兒子小學一年級時，也曾入班現場用槓子頭做羊肉泡膜請全班。

和丈夫一起開雲南泰緬餐廳的翠翠平日非常忙碌，她在多元文化週時到校介紹緬甸出產的玉石，並帶真品給小朋友觀看，介紹緬甸字文、食材料理，包括店裡面出的泡菜、甜點椰子糕、椰奶等，教他們現做現吃。

重視子女教育並選擇離家較遠的南海學區讓女兒就讀、中午親自做素食便當拿去學校的長玲，在女兒幼稚園的多元文化週時出來介紹越南小吃，如河粉以及用花生麵粉皮做的小豆豆，教唱越南歌，以當地兒歌配上台灣版的《兩隻老虎》旋律；後來國小晨光活動時，成教班老師請她介紹越南的打招呼及簡單會話，如謝謝、吃飯、喝水等，她都義不容辭地答應。

月音到學校用 PPT 介紹馬來西亞的國慶、華人的教育體制、印度教的大寶僧節、回教的禁忌（不喜歡被摸頭，不用左手與人接觸，因左手是用來清洗下部），比較生動的是她曾當場示範表演 Sarong 的多種用途。這種布巾大人小孩都可以用，但她不太會拿來穿，其實除了當服飾如大人做月子時穿很舒服外，Sarong 還

可以做小孩的鋪墊、搖籃、吊床、小枕頭、斜肩背小孩的袋子、到海邊換衣服時的遮羞布，最後的剩餘價值是老一輩華人會拿來當尿布。

受訪者中的阿香、小沛、榮兒三位不僅在學校展演，校園之外各種東南亞文化相關節慶交流活動，也都出現過她們的身影。從小就喜歡跳舞的阿香，輪廓深邃很像原住民，她在兒子幼稚園大班結業典禮上，母子同台演出越劇《鼓飯》；中班的父母來校日當天，表演越南的體育舞蹈並介紹越南文字；到了小學一年級園遊會時，自己做春捲和蝦餅一下全都賣光，到 YWCA 上烹飪課學台灣菜擔任通譯，結業時她也會做各式各樣的越南菜請大家吃。

外型亮麗大方、穿著洗練並流露時尚風格的小沛，目前擔任通譯、廣播節目主持人及越語老師等受薪工作，也做過多場官方餐會及晚會節目主持人，算是見多識廣的活躍女性。小沛在女兒學校的多元文化週時，把越南國服、斗笠、裝飾品、下龍灣的石頭、三輪車、壁畫、漫畫等所有道具全部帶到現場，透過講述方式介紹越南，並播放自己展演的影帶和公視拍攝她返鄉故事的影片。閒暇之餘，配合新移民會館、越南辦事處、表演工作坊、紙風車劇團等單位的需求經常演出，還在朱宗慶打擊樂團表演時朗誦越南詩歌。小沛說她重視每一次的展演機會，盡可能運用巧思帶動現場氣氛，譬如，孩童不瞭解越南服裝，她就強調服裝會說話，把自己修習空大「服飾與生活」課程所學到的概念運用出來，讓學童知道越南國服、鞋帽到底該怎麼穿，小朋友馬上變得好奇熱絡，紛紛搶著上台試穿。為了給自己信心，她開場時通常會先講一連串的越語，但最後冒出國語的「掌聲鼓勵」，全場當然鼓掌，因為大家只聽得懂這句，也算是給自己打氣。有時她會帶動全場朋友雙手環抱敬禮，「先借一雙手給我，鼓勵我」，這其實是越南人尊敬的打招呼方式，特別是晚輩對於長輩，這也成為她創造自信的方法。

（二）扭轉對母文化的誤解

從受訪者對展演經驗的詮釋中明顯發現到，她們感覺台灣人對其母文化有不少誤解乃至於偏見歧視，而且常常是基於強烈的二元對立，以「台灣是先進、優越 vs. 東南亞/大陸是落後、鄙夷」的方式露骨地表達，可說是東方主義(Orientalism)也就是「爲了對東方宰製、建構、壓迫而存在的西方樣式」的台灣版複製。具體經驗包括了：台灣人對於她們母國原始、封閉、落後、搶劫、排華的連想，對於

她們母文化中特定飲食習慣、身體動作、風俗民情的否定，透過出來展演的機會，新移民女性將這些誤解做了澄清或重新詮釋。⁷

小暉說自我介紹來自中國雲南時，常被反問到雲南是什麼地方啊？是不是很原始、封閉、落後，是否都沒有紅綠燈、牛兒都在大街上亂跑？因此，她很希望把雲南的「真實景象」介紹出去。學校輔導室一開始找小暉上台介紹中國時，原本只要她把文字稿唸唸即可，但她覺得這種方式很無聊，於是改成母女同台脫口秀，透過雲南方言劇的兩個人物，介紹雲南十八怪（第一怪竹筒當煙袋、第二怪草帽當鍋蓋、第三怪這邊下雨那邊曬、第四怪四季服裝同穿戴……）的順口溜，用海報紙做十八張故事畫圖形和情節，把雲南民風民俗含在裡面。

身材圓滾滾、充滿母性、始終堆滿笑容的榮兒滔滔不絕地講道，她想介紹「正確的」印尼文化給台灣，印尼不是只讓人連想到搶劫、排華等負面訊息。她到學校時用 PPT 介紹印尼的旅遊風景、學校制度、日常生活、習慣宗教、節慶過年，教唱印尼歌曲及遊戲，介紹各行各業的香料咖哩時也會拿實物給人看。

個性內向寡言的珍珍，本來要在學校朝會時上台介紹新加坡，但下雨天改用擴音器向全校廣播，她希望讓大家瞭解「新加坡有多麼先進！」，短短十五分鐘內，介紹了新加坡的基本概況、人口地理面積、校園制度，強調新加坡雖是多元種族的國家，但種族歧視少是因為以英語為官方語言，考量各族心態，所以英語教育很重要。⁸

成教班的老師要安安出來介紹印尼的飲食文化，她挑選的是印尼人常吃、卻是台灣人一般不太喜歡的油炸食物，如蝦米餅片、木薯片、綠豆餅片、花生餅片等，老師還以蝦餅做為多元文化週學童闖關獲勝的禮物。安安有點靦腆卻總是笑顏燦爛，雖然，她只負責前製作業和幕後的油炸工作，嚴格說來只是出力而未完全現身，但她認為能出來幫忙就很高興，在介紹蝦餅的材料和製造過程時，大家

⁷ 林津如、王介言、吳紹文（2008：277-279）也提到，在工作坊中請新移民女性說出她們經歷的跨文化差異，並轉為應邀到各級學校講解多元文化的基本教材，透過真實的生命經驗及深入淺出的方式，引導台灣人認識差異、理解差異。

⁸ 珍珍也參加慈濟大愛媽媽的活動走入校園，但不是在介紹新加坡文化，而是宣導感恩關懷、禮貌知足、惜福的重要，在兒童節、母親節、聖誕節時到各國小講故事或演戲給小朋友看，透過教師節、畢業典禮舉辦孝親的奉茶、洗腳活動。

還是覺得很有趣很好吃，似乎很捧場。

小沛強調越南人的家庭文化，通常是一般書本較少寫的，譬如，很多台灣人在越南小吃店看到越南女性翹腳或抬腳，感覺非常不雅，其實，這和越南的飲食空間及習慣有關，因為在越南「床」是用來吃飯及睡覺用的，越南人以前大多是坐在地上吃飯，腳自然會翹很高，以前能夠在床上或桌上吃飯的是官員及有錢人。還有，台灣人覺得越南人很俗氣，喜歡叮叮噹噹地穿金戴銀在身上，那是因為過去戰爭不斷，為了逃難有錢就趕快買金子放在身上，要離開時才能立刻帶走。

從透故展演找回熟悉的今昔、扭轉對母文化的誤解這兩點，讓我們窺見到，新移民女性試圖找回被剝奪的主體性所做之努力，正如不少先行研究曾提及的，移民面對來自接待社會的壓迫、排擠時，採取的策略之一是回到過去（Back to the Past），也就是返回熟悉的原生文化或傳統文化去找尋慰藉或資糧。譬如，Takeyuki Tsuda（2003）研究 1990 年放寬日裔返國優惠法案下日裔返回移民（return immigrants）對日本社會加諸給他們的邊緣化之回應，發現到日裔在巴西時，被視為（也相當自負於）具有純種日本血統的優良少數民族（positive minority），不過回到日本後，卻被日本人貶抑成混雜著巴西文化的劣等少數民族（negative minority）。為了對抗這種巨大的落差與失望，日裔通常會去強調己身擁有的巴西文化，而非一味地向曾經引以自豪的日本文化全面靠攏，這種在日本境內被日裔移民拿來對抗「同種不同文」的日本同胞而強調出來的巴西文化，可說是「去地域的移動國族主義」（deterritorialized migrant nationalism）。同樣地，印度文化心理學家及後殖民理論家南地（Ashis Nandy）也曾主張，被壓迫者為了去殖民（decolonization）所採取的手段是「批判性的傳統主義」（critical traditionalism），就是重新詮釋傳統來創造新的傳統，從印度聖雄甘地和詩人泰戈爾的思想中，挖掘出具有時代性的因子，並接合到現實生活裡來創造新的傳統，甚至將另類西方（未與殖民主義共謀的西方）與印度傳統相結合，找出更高層次的普同主義以對抗西方的宰制。（陳光興 1997：190-191）這些論點和本研究中新移民女性出來展演母文化之特性似乎有些許相似，她們的確是回到過去，從原生文化找尋慰藉的材料，而且多是沒有太大爭議、已然定著的內容。然而，這樣的展演內容是否已經足夠、是否還有所欠缺、沒有值得進一步再商榷之處？

平心而論，新移民女性的這些展演內容，至少有以下三點「闕如」之處：(1) 展演內容幾乎談不上將她們自身的傳統重新詮釋加以創新，頂多是料理口味的變化或融合（後述），只是去陳述、去介紹一般台灣人越來越耳熟能詳的母文化內容，但可能對多數孩童而言，是初體驗的第一次接觸。(2) 展演內容並沒有和台灣文化做積極的對照對比，僅止於去說明她們母文化單方面的情形而已，這和邱淑雯（2008：85-86）研究川崎市女性民族文化講師的參與形態會透過和日本文化的對比對照去鋪陳、去說明是截然不同且略顯單薄的。(3) 展演內容不會觸及她們在台灣的「真實生活」，特別是飽受夫家壓迫或是來自大社會歧視的負面經驗，這又和 Hall, Keane-Dawes & Rodriguez（2004）三位合著《體現後殖民生活：來自移民的抵抗》（*Embodying the postcolonial life: Immigrant stories of resistance*）一書有著極大差異。該書批判美國學院內的西方理論霸權，多數人拒絕傾聽來自異文化世界的聲音，因此，他們才要努力描述加勒比海裔移民學者在美的真實生活，提供讀者思考認同、國族主義、權力等概念，如何從移民在接待社會的日常生活（而非只是回到過去、回到傳統）此一情境中被重新定義。⁹

那麼要追問的是，為什麼本研究中新移民女性的展演欠缺上述這些內涵呢？推測可能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是主事著的教育局、各校教師或主辦者的心態使然，也就是說，承辦單位就是希望她們展演的內容層次僅止於 3F：食物（Food）、服裝（Fashion）、節慶（Festival）即可，或許這是承辦單位對於異文化展演的認知就僅止於此，也或許是考量到學童的理解程度和觀眾的接受與否，不希望因話題過於敏感，造成展演者與觀看者雙方的尷尬、甚至難堪。二是展演者的新移民女性也言聽計從，不認為有何不妥，或即使認為不妥也不敢有所異議，她們不願去碰觸這些敏感話題，是她們選擇在接待社會的一種安全活法。¹⁰同時，新移民女性對於台灣的認識也還有限，無法進一步與其母文化做對比、對照，只能片面地

⁹ 「去殖民」是後殖民理論的核心議題，不少學者都提出去殖民的手段或策略，Keane-Dawes（2004）在此書中建議，以加勒比海的文化去檢證美國的白人男性（backra），是一種可能的反抗方式，讓始終感到居於劣勢、被邊緣化的移民有機會自我平反，而非只被接待社會的主流價值不斷檢視。

¹⁰ 邱淑雯（2008：84-92）研究日本川崎市女性民族文化講師的參與形態，以異文化的介紹為主，偶爾觸及反歧視的啓蒙議題，多數講師不願觸碰外國人在日本真實的生活情境，不會挑戰教育委員會的指導方針，不想忤逆校方的既定安排，也不去製造和學童或日本教師之間的衝突場面。

介紹、展演自己的原生文化而已。還有，新移民女性對於自身母文化的理解是否完全無誤也不得而知，她們能否將所謂傳統重新詮釋加以創新也有待確認。

雖然有這些展演內涵上的不足，但透過展演，新移民女性在主體性的重構上是否仍有一定的斬獲？她們如何詮釋來自展演之後的具體回饋或改變？

六、展演過後：自/他關係的變化

台北市國小的多元文化週至今只舉辦過四屆，「邀請新移民父母到校展演文化」雖是教育局的指定項目之一，但各校未必年年舉辦，受訪的教師普遍認為，現階段討論此項活動對於師生的影響還言之過早、尙未顯見。多數學童對於「邀請新移民父母到校展演母文化」這項活動的反應只是好奇、開心，體驗活動的吃喝玩樂沒有學習壓力，故學習效果也有限，打招呼或問候語短時間內體會一下，如玩遊戲般很快就被遺忘，因此，目前無法測出展演帶給教育現場師生的確切影響。但展演過後，帶給新移民女性自身的變化，特別是她們自身潛能的開發、個性的轉換、自信的提升等方面確實是存在的，且這種變化並非透過學校的師生立場去省視，而是由當事人對展演的經驗詮釋而得知。¹¹

譬如，以外籍母親自身的潛能開發為例，就是因出來現身展演，而讓原本「沒有發揮的潛能」得以出現、得以長養，故這個自我已經非過去的那個自己，而是改變創新之後的自己，特別是個性從害羞、緊張變得比較開朗、大方。阿紅強調，她來學校與母職沒有太直接關連，和小孩班上的導師反而比較沒有互動，她希望孩子自然成長，「做志工是我自己的事，收穫也是我自己的！」發現自己在公開場合拿麥克風講話越來越嫻熟，不管是學校讀書會還是兒子到關渡上慈濟成長營時的心得分享，她都敢站出來說話了。珍珍在多元文化週只有一次展演的經驗，她謙虛地說自我成長的部份比較慢，不過一回生二回熟三回變高手，她開始想改變原本害羞內向的個性，希望變得開朗而大方。她也不是一個人單獨登台，透過一群人共同表演可以先壯膽，所以現在去慈濟上課、排練、當志工都是她生活的

¹¹ 邱淑雯（2008：92-97）研究日本川崎市女性民族文化講師的參與回饋，以她們詮釋學童及學校教師的回應態度，捕捉女性移民對國際理解教育產生的社會變革之看法，並將此看法扣連到她們「被日本人歧視、排除、當成異類」的這個在地日常生活經驗裡。

重要安排。榮兒婚後的前四年都在家帶小孩，沒出門也沒時間學習，後來才去永和社大上識字班，當時，老師就鼓勵她出來展演印尼文化。現在回頭看自己第一次介紹印尼料理的影片都覺得羞愧，因為個性容易緊張，但如果有人鼓勵就不會，大家彼此互相打氣也就敢站出來了，現在她變得比較不害怕，也是這幾年磨練下來的結果。

受訪者中的榮兒、小沛、阿香三位除了學校的多元文化週之外，其他的節慶交流活動也都出現過她們的身影，透過展演，她們的自信與美麗更是溢於言表，這些「自信」到底從何而來呢？榮兒說道，展演時多少都要化妝打扮才能粉墨登場，人漂亮了自然變得有自信，她曾經在母親節的印尼服裝秀上展演，「那也不是隨隨便便找個人就可以出來的！」言談中流露出滿足自負的神情。還有，她以前不太會做菜，家庭主婦得煮三餐外，後來參加各處的園遊會擺攤，多了不少機會磨練廚藝，且常常自創新法，譬如印尼涼拌加鹹菜，台菜比賽時則放入印尼香料，還因此得過獎呢。在伊甸教越南語、主持越語廣播節目、擔任多場活動節目主持人、上過于美人《WTO 姐妹會》的小沛說，以前不注意也不在乎越南文化是什麼，但現在為了展演講述母文化，自己要準備要查資料要閱讀複習，所以她肯定自己會不斷成長下去，強調這些參與都讓她變得更有自信、更有活力。阿香主要的展演經驗是在舞蹈，她愛玩也喜歡安排生活，展演所需的化妝、服飾、音樂都要自己準備，還得負責編舞、教舞並親自登台跳舞，新移民會館開幕時就出去表演，上了國中補校也出去比賽還得過不少獎，這些都成為她自信的重要源頭。由此觀之，為了展演，新移民女性的付出與收穫是有目共睹的，外表的美麗裝扮、必要的準備工夫、大大小小的得獎記錄等實質成果，成為她們自信的重要泉源。

從潛能的開發、個性的轉換到自信的提升，的確讓我們看到新移民女性展演過後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回到本文的主軸：移民的文化展演與主體性重構此一脈絡，展演過後，她們的主體性重構到底會是什麼？田辺明生（1999）談到主體性這個概念時強調，相對於社會結構的龐然與強勢，所謂的主體性是要凸顯個人行為的自發性、變革性與創造性。主體性特別重視的是，個體與他人溝通的能力，透過和具體他人的連接、互動與交涉，個體如何重構改變與他人的關係。這裡所說的主體性並沒有被社會結構完全支配，但也沒有得到完全的自由，而是在自/

他交涉的過程中，依行爲的策略性、自發性、創造性，重組自己所處的位置以及與他人的關係，甚至找出自/他的共通性。可以清楚看到，主體性不會單獨存在，它必須被擺放在自/他關係中來加以檢驗和論述，釋自淳、夏曉鵬（2003）以及鍾鳳嬌、林苑平、趙善如（2008）等先行研究，從培力、增能（empowerment）的觀點，探討新移民女性在參與中文識字班或基礎電腦班後各種家庭鄰里內自/他關係的重組。那麼，透過展演，本研究中的新移民女性自/他關係的變化會是什麼？又，這裡的「他」到底所指為何？

如前所述，在談到外籍母親如何從現身到展演時，她們其實是把展演與「走出家庭、向外發展、當志工、學習」劃上等號或當成一種延伸活動，她們積極參與的特質背後，其實隱藏了與自我、與夫家、與台灣大社會衝突，並試圖超越這些衝突所做的努力，這也成爲她們願意現身、願意展演的另一動力來源。到目前爲止，與夫家關係的明顯改善是出現在阿紅的身上，她覺得自己當志工這兩年來，感到時光飛逝而非度日如年，在家時間變少，接觸負面的磁場自然也少，感覺快樂心情變好，教小孩時也變得有耐心，家庭氣氛好先生當然支持她繼續出來。珍珍的婆婆年初剛過世，終結了她們長年交惡的夢魘；阿香和安安則繼續以躲避的態度，找尋夫家以外的生存空間。所以，當問到透過展演，新移民女性自/他關係的變化會是什麼時，只能先鎖定她們如何詮釋與子女、與台灣大社會的關係重組，簡言之，她們如何感覺到自己「找回被剝奪的主體性」，分別從子女的肯認與台灣人的接納兩點來看。

（一）子女的肯認

李國基（2007）以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就讀小學高年級子女爲對象，探討其雙族裔認同（biethnic identity）的困境，研究發現，這些子女在不均衡的權力互動中，進行父母雙方族群文化的傳承，形塑出他們失衡的文化載體與碎裂的族裔認同。譬如，子女建構母方族群意象的訊息來源有限，容易對母方族群形成刻板印象，因母親身分受到嘲笑，而造成其對母親的賤斥，甚至母親自身的尷尬身分認同，也會滑移至其子女身上，子女往往因對母親族群文化形成斷裂與疏離。但外籍母親也會採取不同策略加以轉換，重構其在家庭以及在子女心目中的地位，包括：強調類同、淡化差異、區隔異類、掩飾、積極融入、寄託孩子學業成就等。本研

究中出來展演的外籍母親，是試圖以積極勇敢的態度扭轉劣勢的能動者（agent），無庸置疑地，展演過後，來自自己子女的肯認與接受，對身為母親的她們而言是極大的肯定，透過到校的現身展演，其子女越來越能以母為榮，不會再在意母親的口音、長相或是身份，也對母親的原生文化越來越能接受。

阿紅說她不會在意別人叫她大陸妹或大陸新娘，也不管她和台灣人的口音氣質之差異，並不想因為出身不同而躲躲藏藏。她說在中國從小就被灌輸要愛國要認同自己的國家，同樣地，「兒不能嫌母醜，狗不能嫌家貧」，她認為她的小孩也很有自信以她為傲，可以大聲地告訴別人「對，我媽媽就是大陸人！」開餐廳很忙很累，還是抽空擔任晨間導護媽媽的翠翠說，兒子上幼稚園時她的口音還很重，小朋友說：「妳講什麼我聽不懂啦！」現在都不會了，兒子很高興她去學校展演，不會因為她講話不標準而感到丟臉。小沛在女兒小一時去學校參加親職講座，當時女兒會警告她：「媽媽，你不要坐太前面，坐第五排之後。」她說可能是自己看起來太年輕了，別人的媽媽年紀都很大才敢坐前排，但也可能是女兒很害羞，因為小沛會舉手問問題，但講話的口音讓女兒覺得丟臉，但現在她們已經以母親為榮了。最值得一提的是，阿香出去展演時都把兒子帶在身邊或安排同台獻藝，刻意教兒子跳舞唱歌，給他零用錢、買玩具送他鼓勵他，兒子長期耳濡目染下，也變得喜歡越南舞曲，很容易就會背舞背歌，訪談時坐在她身旁的兒子當場輕輕哼起越南舞歌。

（二）台灣人的接納

後殖民理論大師法農（Frantz Fanon）在其經典名著《黑皮膚、白面具》中曾提過瑪諾尼（O. Mannoni）的《殖民心理學》一書，認為它掌握了「土著－殖民者」兩者關係之所以存續其背後支配性的心理現象，其中關於被殖民者的部份，有所謂被殖民者的依賴情結，也就是殖民者的白人依循著一種權威情結和領袖情結，但相對地，被殖民的馬爾加什人則依循了依賴情結（dependency complex），他們得依賴著白人，而讓白人成為被等待的主人。（陳瑞樺 2005：153-169）法農本人也生動地描述渴望乳白化（lactification）的黑人女性之心境，她們不僅渴望「褪色」，更渴望在白人的眼神中獲得平安與認可，因為，對黑人而言，能夠遇到一個仁慈親善、體諒別人的土巴（歐洲人），代表了一種新的理解的希望。（陳

瑞樺 2005：111-118) 可以說的是，對有色人種或弱勢者而言，來自強勢者的肯定與關愛，常常是自我肯定的重要基礎來源，當弱勢者被文化經濟上相對強勢者所肯認時，他也才能完成進一步的自我肯認。

類似被殖民者或黑人女性的這種心理情結，或許不盡然會出現在本研究的受訪者身上，但對許多新移民女性而言，儘管來自台灣大社會的歧視或不太友善的對待如影隨形，不可否認地，她們仍渴望得到來自台灣人的正面肯認。阿香和小沛兩人展演經驗相當豐富，阿香說出來展演也間接學習台灣的各種風俗，認識很多台灣人，台灣人也教她很多事，讓她學習到很多。在大安森林公園表演時，台灣人要求一起拍照留念，《聯合報》刊出她和兒子登台前一起吃便當的斗大照片，移民署海報則是兒子吃越南鴨仔蛋的圖片，這些來自台灣人的正向回饋，都令她非常高興。多年的展演經驗讓小沛越來越有自信，她說如果都待在越南，她可能也接觸不到什麼大場面，也不會拿麥克風講話，能來到台灣自己算是很幸運的，「台灣給她人生一個全新的舞台！」不過，本研究其餘受訪者大多只有一兩次在學校的展演經驗，因此，在問到她們和台灣大社會的關係變化時，只能先從學校這個場域去觀察。那麼，學校對於這些願意現身、願意展演的外籍母親而言，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所在？幾乎所有受訪者都一致肯定，校方和老師們親切有禮，相對於來自夫家的壓迫或大社會的歧視，學校，是一個相對公平親善的地方，她們願意現身校園，也是因為在此可以得到些許喘息，乃至於一定的肯認，校園中的台灣人特別是孩童、教師、還有其他家長都慢慢對她們投以善意的回應。

1、來自孩童：外籍母親在多元文化週現身、展演之後，最直接感受到的效應是被小朋友一舉認了出來。阿紅說學童在走廊看到她的反應是：「啊！我知道了，阿姨，妳是陝西人」，演講時碰到會叫「愛心媽媽好！阿姨好！」她感覺自己受到尊重，學校是平等的，沒有階級沒有歧視的地方。月音也說學童的反應是傻眼，「原來妳是馬來西亞人喔。」看到我會叫「馬來西亞的媽媽。」珍珍展演完畢，有三位小朋友對她說：「我今天聽到妳在講新加坡的事喔！」「今天講新加坡的是不是妳啊？」長玲表演介紹越南文化不久，就有小朋友認出她說：「妳是黃○○的媽媽！黃○○媽媽，妳好！」小沛上多元文化週的課程是在學校的大講堂，連續進行四個月，小一到小六的學生幾乎都聽過她的課，女兒回來對她說：

「有小朋友跟我講你媽媽很正耶！」兩個禮拜後女兒把這個小朋友帶到家裡來做布丁。除了外籍母親本人外，小暉的女兒自從在多元文化週母女同台演出後一舉成名，成爲全校風雲人物，被人認同被人肯定，男學生故意經過女兒班級門口大叫說「陳○○，你好棒喔！」她也變得更加自我肯定。

2、來自教師：不僅「被人認出來」這件事倍感欣慰，和學校老師的良性互動也變得密切，這種互動有的是直接回饋到外籍母親身上，有的則還原到子女身上。首先，月音說學校很安全沒有歧視，阿紅也說校方對志工很鼓勵很親切，她們只是付出一點點，校方就給予高度肯定，而且有求必應馬上處理，不會推來推去，讓她覺得很溫暖。長玲本來就常現身校園，對學校並不陌生，老師對她也有印象，畢業典禮時還特別爲她準備素食，感謝志工媽媽的協助，也常主動通知她一些重要訊息，如母親節有關外籍媽媽的活動資訊。翠翠後來也現身在自然科的教室裡，老師教小朋友炒菜請她在旁邊幫忙實做，因爲知道她是開餐廳的。其次，既然是到子女就讀的學校展演母文化，良性互動牽引出的實質效應就是，子女受到教師更多的關注，珍珍說她到校展演雖然只有一次，但老師都蠻肯定她的表現，認爲母親的參與有助於其子女的學習，老師也對她和她的子女多份印象。阿香到學校現身展演之後，學校老師都很熱心很幫忙很關心，免費幫她兒子安排課輔，主動協助學習。

3、來自家長：這個層面的善意回應也慢慢出現，¹²翠翠說去學校展演後，小孩同班的家長很熱情地帶朋友來她的餐廳吃飯。外型活潑開朗的小沛展演經驗多、知名度也高，出席家長會時其他父母親主動來打招呼讓她感動不已，還有彼此雖不認識，在多元文化週當志工的家長幫她拍照，沖洗完照片後轉交給女兒，她深深感受到，現在台灣家長比較能接受外籍母親了。馬英九總統就職大典時，小暉女兒的學校推出十位東南亞和大陸籍新移民子女參與表演，因常在校園現身而被選爲負責指導排練的小暉回想，三個月的練習經常需要拖到很晚，學童得由家長接送，剛開始有人抱怨「我小孩幹麼要來參加？」她就苦口婆心地解釋給

¹² 除了來自台灣學童及其家長的善意回應外，小暉說其他外籍學童和家長受到鼓舞也開始嚮往展演，「她行，我爲什麼不行？」、「陳○○，其實我也想表演，下次我也想參加。」一位曾做過節目主持人卻始終不願現身的印尼媽媽，至少開始鼓勵自己小孩出來，也在家教小孩表演排練。

他們聽，這是萬中選一、千載難逢的機會。有位老阿公的媳婦是越南人，剛開始也抱怨接送時間太晚，經勸說後逐漸諒解，並肯定這個活動在小孫子生命中的積極意義。

藉由上述的實例說明可以發現，從子女的肯認與校園中台灣人（孩童、教師、家長）的接納，新移民女性感覺到，這是展演後自/他關係變化比較明顯之處，由此，她們也逐漸「找回被剝奪的主體性」，並進一步的自我肯認。

七、結論與後續

本文目的是在探討「女性移民、文化展演與認同」三者之間的關連，並以台北縣市國小多元文化週的外籍母親為研究對象，由她們自身對展演經驗的詮釋，去分析女性移民主體性重構的過程。主要研究發現如下：（1）這些可以現身、願意現身、並出來展演文化的外籍母親，確實具備了許多積極參與的正向特質，但展演動機的背後，卻隱藏了她們與自我、與夫家、與台灣大社會衝突，並試圖超越這些衝突所做的努力。（2）她們真實的展演經驗主要是找回熟悉的今昔與扭轉台灣人對母文化的誤解兩方面，這和多數移民面對來自接待社會的壓迫時所採取的策略頗為類似，也就是返回熟悉的原生文化或傳統文化去找尋慰藉或資糧。然而，她們的展演內容通常是沒有太大爭議、早已定著的，談不上將傳統重新詮釋加以創新，也沒有和台灣文化做積極的對照對比，更不會觸及她們在台灣真實生活，特別是飽受夫家壓迫和大社會歧視那個層面的經驗。（3）展演過後，她們自身的潛能開發與自信的增長確實存在，此外，也從子女的肯認與學校這個場域中台灣人的接納，來省視自/他關係的良性變化。

以上是她們主體性重構的過程與結果，在此，想將本文與探討新移民女性的認同或主體性建構之相關先行研究，做些許對照及反思。不同於部份先行研究將新移民女性圈限在「家」的範疇去解構其困境或出路（特別是母職），本研究的最大意義在於：突顯新移民女性角色的多元性，她們是站在公開場合台前的「展演者」，而不再只是娘家或夫家家庭內的勞動者、再生產者、經濟提供者、一家老小的照顧者，換言之，她們除了人妻、人母、人媳、人子等角色或關係外，還有其他機會去扮演「家庭以外不同的自我」。當然，有些研究已經注意到她們角

色的多面性，譬如，張婷婷、張翰璧（2008）以「客家文化的嶄新傳承者」看待越南和印尼籍的新移民女性，分析她們如何運用飲食烹調策略，但可惜的是，仍圈限在夫家家庭的廚房和飯桌內打轉，無法跨出家的藩籬。此外，林倩綺、王淑治、林菁真、闕菊女慧（2008）初探越南籍新移民女性的休閒行為並加以分類，但該文著重的是行為本身而非角色扮演，也沒有觸及太多關於女性休閒與主體性的議題。

最後，本文後續研究的可能議題之一是，新移民女性展演的母文化內容能否有更大揮舞的空間、能否跳脫現有的框架呢？David M. Guss（2000）認為文化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爭議、沒有定論的場域，特別是在公共空間的文化展演提供了一個平台，可以表達特定族群的集體意識，經常充滿了顛覆性和爆炸性，他在《節慶國家》（*The Festive State*）一書中，描繪了非洲裔委內瑞拉人透過節慶 San Juan 的展演，去挑戰及再定義種族、族群、性別、國族等概念。Diane Negra（2006）也強調，透過展演及流行文化去傳遞愛爾蘭特質的重要，愛爾蘭確實給人一股魅力，卻總是帶點醜聞般的刻板印象（*scandalous stereotype*），但過去這十幾年來，愛爾蘭特質逐漸展現出一種理想型的族群性，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美國，它成為白人認同的可能選項。Negra 反對以本質主義方式再現愛爾蘭（*essentialized representations*），而是以更複雜多元的取徑觀照愛爾蘭的歷史文化，將愛爾蘭過去給人的鈍感特質（*obtuseness of Irishness*）撇除，重新放在全球化流行商品的嶄新情境中，Van Morrison's（1945~）的音樂、Frank McCourt's（1930~2009）的作品、電影《*The Crying Game*》等都是代表性的實例。隨著新移民女性在台灣公共空間內展演母文化機會的增加，其展演內容也可能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批判乃至於質疑，除了本文所指出的三點，也就是這些展演內容有沒有將傳統重新詮釋加以創新，沒有和台灣文化做積極的對照對比，也沒有觸及她們在台灣真實生活，特別是飽受夫家壓迫和大社會歧視那個層面的經驗外，Guss 和 Negra 的觀點也值得拿來省思，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新移民女性展演的母文化也有可能發展成在地的流行文化，或是台灣人認同的一種新選項。

【參考文獻】

中文

- 王光宗（2007）〈東南亞外籍母親在子女入學後母職經驗研究〉，《家庭教育雙月刊》，第6卷24-52頁。
- 王珮瑾（2007）《當越南媳婦遇上台灣婆婆：台灣家庭中外籍媳婦與婆婆互動關係的探討》，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紹文（2005）〈擺脫舊思考、學習新思維：新移民女性的社區工作〉，http://www.comnews.gio.gov.tw/specialcolumn_2.aspx?artical_id=1473。
- 李國基（2007）《東南亞外籍配偶子女雙族裔認同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津如、王介言、吳紹文（2008）〈新移民女性之組織工作：一個跨領域的實踐嘗試〉，夏曉鵠、陳信行、黃德北編《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41-298頁。
- 林倩綺、王淑治、林菁真、闕菊女慧（2008）〈新移民女性之休閒行為初探〉，《運動與遊憩研究》，第3卷第1期110-124頁。
- 林慧卿（2006）《外籍女性配偶母職自我效能與社會支持之相關研究：以臺中縣市識字班學員為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淑雯（2008）〈國際理解教育與女性移民的社會參與：從日常生活的歧視經驗出發〉，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教育與社會研究》，第16期63-103頁。
- 邱淑雯編（2007）〈從圖像看台灣公共空間內「新移民女性」的文化展現〉，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67期12月15日。
- 邱淑雯編（2009）〈新移民女性對展演母文化的經驗詮釋〉，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78期4月15日。
- 胡台麗（2003）《文化展演與台灣原住民》，台北：聯經出版社。
- 張明慧（2004）《新移民女性的母職困局：「新台灣之子」發展遲緩論述的緊箍咒》，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婷婷、張翰璧（2008）〈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與客家文化傳承：越南與印尼籍女性的飲食烹調策略〉，《臺灣東南亞學刊》，第5卷第1期93-145頁。

- 陳光興（1997）〈文明主義的想像：杭廷頓與南地〉，《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7 期 173-197 頁。
- 陳雯鈴（2008）《越裔新移民女性母職教育工作之研究》，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怡瑾（2001）〈婚暴中的權力控治：個人自覺與社會結構互動歷程〉，《台大婦女與兩性學報》，第 12 期 95-137 頁。
- 黃淑玲（2007）《撥雲見日：家有青少年新移民女性之母職經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翟振孝（2005）《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韓建忠（2006）《外籍母親在子女就讀國小後母職經驗之研究》，台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鍾鳳嬌、林苑平、趙善如（2008）〈電腦學習歷程：新移民女性增能經驗分析〉，《社區發展季刊》，第 123 期 336-360 頁。
- 蘇芳儀（2006）《一樣的婆婆、不一樣的媳婦：台灣籍婆婆與其外籍媳婦的相處互動之研究》，台南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釋自淳、夏曉鵬（2003）〈識字與女性培力：以「外籍新娘識字班」為例〉，《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第 3 卷第 2 期 41-84 頁。
- Fanon, F. (1952)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陳瑞樺譯（2005）《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
- Kennedy, V. (2000) *Edward Sai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邱彥彬譯（2003）《認識薩伊德：一個批判的導論》，台北：麥田出版社。)

英文

- Alleyne-Dettmers, P. T. (2000) Afro-Caribbean carnival as ethnic empowerment and migrant organization: Image building and women's changing role in contemporary carnival. In J. Knorr and B. Meier(eds), *Women and migr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 Guss, David M. (2000) *The Festive State: Race,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s Cultural Performance*. Californi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ll , Maurice L., Keane-Dawes , J. & Rodriguez, A. (2004) *Embodying The Postcolonial Life: Immigrant Stories Of Resistance* . New York : Humanity Books.
- Joseph, M. (1999) *Nomadic Identities : The Performance of Citizenship* .Minnesota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urashige, L. (2002) *Japanese American Celebration and Conflict: A History of Ethnic Identity and Festival, 1934-1990*. Californi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ngel, L. (ed.) (200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reative Practice: Music, Dance, and Women' s Cultural Identity*. Westport, CT: Praeger.
- Lengel, L. & Warren, J.T. (eds.) (2005) *Casting Gender: Women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s*. New York: Peter Lang Press.
- Negra, D. (ed.) (2006) *The Irish in Us: Irishness, Performativity and Popular Culture*.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unciman, W. G.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 Californi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Tsuda, T. (2003) *Strangers in the ethnic homeland : Japanese Brazilian return migration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日文

- 安貞美 (2008) 「韓国における移住女性：映画〈she is〉を中心に」、千葉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報告書第 156 集『身体・文化・政治』、正文社 85－96 頁。
- 安貞美 (2009) 「視覚文化における国際結婚移民女性：韓国テレビドラマ〈黄金花嫁〉を中心に」、
<http://mitizane.ll.chiba-u.jp/metadb/up/irwg10/Jin-H195-05.pdf>。
- 玄武岩 (2005) 「浮遊するディアスポラ「延边チョンガ」をめぐる中国朝鮮族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東京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環紀要『情報学研究』、3 月 69 号 83-100 頁。

- 小林久高（1997）「社会学と主体性」、島根大学法文学部『社会システム論集』、
2号 41-61 頁。
- 高橋雄一郎（2005）『身体化される知：パフォーマンス研究』、せりか書房。
- 田辺明生（1999）「人類学・社会学におけるエージェンシー概念について」、
季刊『南アジア構造変動ネットワーク』、2巻1号 65-66 頁。
- 田渕知子（2008）「韓国をめぐる諸問題への取組み：多文化家族～増加する女
性結婚移民者の地域社会適応支援」、『自治体国際化フォーラム』、6月
224号 2-6 頁。
- 水越紀子（2003）「在日フィリピン人女性とフェミニズム：＜語られる＞日本
人を解釈する」、大阪市立大学『人権問題研究』、3号 53-65 頁。
- 吉田民人（1991）『主体性と所有構造の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

**Performance experience of new immigrant women and their
Subjectivity of Reconstruction: : Foreign mothers at
primary school's multicultural week in Taipei city and
coun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of "female migration, 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identity". Studying object is foreign mothers at primary school's multicultural week in Taipei city and county, and by example of their annotation over the performance experience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their subjective reconstruction. The main findings are (1) Those foreign mothers can come out, willing to come out, and perform culture did hav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many positive characters. But the performing motivation contains the conflicts with themselves, husband families and Taiwan society, and their effort to overcome these conflicts. (2) Their performance experience are seeking the familiar present and past time, and trying to dispel th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eir culture from Taiwanese, namely, they come back to the homeland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o search the consolation. Most of their performing contents are no disputing, no re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 with creative innovation, no comparison with Taiwanese culture, no touch about their real life in Taiwan, especially oppression and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 from husband family or Taiwan society. (3) They actually discover potentiality and increase confidence after performing culture, meanwhile they also find out the good change in human relations from their children's and Taiwanese's consent.

keywords : performance experience, new immigrant women, subjectivity, coming out.